

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

林传甲 朱希祖 吴梅 著
陈平原 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

林传甲 朱希祖 吴梅 著
陈平原 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林传甲,朱希祖,吴梅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9

(博雅文渊阁)

ISBN 7-301-09617-8

I. 早… II. ①林…②朱…③吴… III. 文学史-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IV. 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1874 号

书 名: 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

著作责任者: 林传甲 朱希祖 吴 梅 著 陈平原 辑

责任编辑: 张凤珠

标准书号: ISBN 7-301-09617-8/I·075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2

排 版 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 北京原创阳光印业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39.75 印张 250 千字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 序

陈平原

1903年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在“文学科大学”里专设“中国文学门”，主要课程包括“文学研究法”、“《说文》学”、“音韵学”、“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四库集部提要”、“西国文学史”等十六种。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要求讲授“西国文学史”，以及提醒教员“历代文章源流”一课的讲授，应以日本的《中国文学史》为摹本。此后，“文学史”作为一种必修课程、一种著述体例以及一种知识体系，便在中国学界落地生根了。此举不仅改变了中国人传习“文学”的方式，甚至影响到日后的文学革新进程。

几年前，我曾撰写《新教育与新文学——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一文^①，从新式学堂的科目、课程、教材的变化，探讨新一代读书人的“文学常识”。从一代人“文学常识”的改变，到一次“文学革命”的诞生，其间有许多值得大书特书的曲折与艰难；但推倒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的，我以为是后人眼中平淡无奇的课程设计与课堂讲授。具体论述时，除了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我还讨论了民初代表桐城、选学两大文派的《春觉斋论文》（林纾）、《文学研究法》（姚永朴）、《中国中古文学史》（刘师培）、《文心雕龙札记》（黄侃），以及“五四”新文化时期的四种重要著述，即《欧洲文学史》（周作人）、《中国小说史略》（鲁迅）、《词余讲义》（吴梅）、《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最后一种，虽非北大讲义，也与作者在北大的工作息息相关。

^① 此文初刊《学人》第14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后收入《北大精神及其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和《中国大学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因吴梅《中国文学史》讲义的发现,促使我反省另一个问题:上述九书,之所以体例迥异,是否跟大学里的课程设置有关?回头看1918年北大发布的《文科国文学门文学教授案》,其中明确规定:“文科国文学门设有文学史及文学两科,其目的本截然不同,故教授方法不能不有所区别。”前者的目的是“使学者知各代文学之变迁及其派别”,后者的功用则为“使学者研寻作文之妙用,有以窥见作者之用心,俾增进其文学之技术”^①。一年半后,国文教授会再次讨论教材及教授法之改良,到会十五人,包括钱玄同、刘半农、吴梅、马幼渔、沈兼士、朱希祖等。为便于交流磋商,此次教授会甚至决定“教员会分五种”:文学史教员会、文学教员会、文字学教员会、文法教员会、预科国文教员会。^②新文化运动以前,虽无明确分工,可林传甲与姚永朴二书的巨大差异,同样蕴涵着“史的传授”与“文的练习”两种截然不同的课程设想。如果进一步划分,所谓的“文学史”讲义,其实包括通史、断代史、专题史以及专题研究四类,很难一言以蔽之。

随着学术史研究的兴起,作为中国人撰写并刊行的第一部文学史,林传甲在京师大学堂的国文讲义受到广泛的关注。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于是,很多人转而指责该书见识迂腐、学问浅陋。《奏定大学堂章程》的提醒,以及林氏的自述,使得世人较多关注此书与其时已有中译本的《历朝文学史》(笹川种郎作)的关系。这自然没错,只是林著对于笹川“文学史”的借鉴,尤其是将其改造成为“一部中国古代散文史”^③,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大有来头。

林著共十六篇,对照《奏定大学堂章程》,不难发现,此十六章目,与“研究文学之要义”前十六款完全吻合。至于后二十五款,牵涉到古今名家论文之异同、文学与地理之关系、有学之文与无学之文的分别、泰西各国文法的特点等,与“文学史”确实有点疏远,不说也罢。对此写作策略,林著《中国文学史》的开篇部分有相当明晰的交代。

正因此,谈论林著之得失,与其从对于笹川著述的改造入手,不如更多

① 《文科国文学门文学教授案》,1918年5月2日《北京大学日刊》。

② 《国文教授会开会纪事》,1919年10月17日《北京大学日刊》,见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1709—171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③ 参见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第783—78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关注作者是如何适应《奏定大学堂章程》的。比如,常见论者批评林著排斥小说戏曲,可那正是大学堂章程的特点,林君只是太循规蹈矩罢了。就在林书撰写的那年,京师大学堂发生了一件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的事:学生班长瞿士勋“携《野叟曝言》一书,于自习室谈笑纵览,既经监学查出,犹自谓考社会之现象,为取学之方”。结果怎么样?总监督的告示称:“似此饰词文过,应照章斥退;姑念初次犯规,从宽记大过一次,并将班长撤去。”^①

朱希祖的《中国文学史要略》讲文,讲诗,讲词,讲南北曲,同样不涉及小说。那是因为,该讲义虽刊行于1920年,实际上早在1916年便已成稿,因此作者必须在《叙》中郑重声明:此书“与余今日之主张,已大不相同”;“讲演时当别授新义也。”至于1917年秋天进入北大任教的吴梅,其编写文学史讲义,不能不受同事鼓吹新文化的影响,小说于是成了中国文学史上必不可少的重要文类。所有这些都说明,作为讲义的文学史不可能闭门造车,而是与政府决策及当代思潮紧密相联。

林、朱、吴三位学者各有其业绩,我关注的只是其在北大讲授的文学史课程。林传甲(1877—1922),字归云,号奎腾,福建闽侯人,任教北大时间最短,1904年被聘为国文教习,1906年已奉调黑龙江,做官去了。吴梅(1884—1939),字瞿安,号霜厓,江苏长洲人,1917年9月应北京大学聘,讲授文学史及词曲,1922年秋后应东南大学聘,举家南迁。朱希祖(1878—1944),字遏先,一作逖先,浙江海盐人,在北大工作时间最长,1913年受聘于北京大学,先后担任过预科教授、文科教授、国文研究所主任、中国文学系主任、史学系主任,直到1932年方才离开。

林传甲撰写并印行于1904年的《中国文学史》历来备受关注,比如,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容肇祖《中国文学史大纲》等,都将此书作为最早由中国人撰写的文学史来表彰。近年夏晓虹《作为教科书的文学史——读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戴燕《文学·文学史·中国文学史——论本世纪初“中国文学史”学的发轫》和陈国球《“错体”文学史——林传甲的“京师大学堂国

^① 参见《大学堂总监督为学生瞿士勋购阅稗官小说记大过示惩事告示》,《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25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文讲义”》，更对此书有专门的评述。^① 学界之谈论朱希祖，更多肯定其史学方面的贡献；因而，其文学兴趣及《中国文学史要略》极少被史家提及。至于吴梅，世人对其任教北大，讲授词曲之学，多有褒奖之词，缺的只是刚刚发现的《中国文学史》。^②

一般人心目中，朱希祖是著名史学家；这自然没错，其对北大历史系的贡献，至今仍被称道。可人们很少注意到，朱希祖初到北大那几年，教的是中国文学史。查看1917年11月29日《北京大学日刊》上的《文科本科现行课程》，不难发现，朱希祖给中国文学门一年级学生开“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古迄建安）”、给二年级学生开“中国古代文学史”，给英国文学门一、二年级学生开“中国文学史要略”，就是没在历史系开课。1919至1920年度《国立北京大学学科课程一览》中，朱希祖所开课程包括：“中国文学史要略”，2学时；“中国文学史（一）”（欲专习中国文学者习之），2学时；“中国诗文名著选”，4学时；“史学史”，1学时。^③ 只是在1920年出任史学系主任后，朱希祖所开课程，方才逐渐转移到史学方面。

新文化运动时期，早年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朱希祖，对文学革新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甚至参与发起了文学研究会。郑振铎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还专门选录了朱希祖刊发于《新青年》6卷4号的《非“折中派的文学”》和《白话文的价值》二文。前者称：“要晓得旧思想不破坏，新事业断不能发生的；两种相反对的主义，一时断不能并行的”；后者除再三辨正白话文的价值，更着重强调输入新词语的意义：“若打破古例，输入外来的新语，则文学的思想界，正如辟了救国的新疆土，又添了救国文学上的新朋友，岂不有趣？”^④ 这话由留日学生、且又是章太炎高徒、北大教授的朱希

① 参见夏晓虹《作为教科书的文学史——读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文学史》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戴燕《文学·文学史·中国文学史——论本世纪初“中国文学史”学的发轫》，《文学遗产》1996年6期；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二章《“错体”文学史——林传甲的“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

② 参见本书附录《不该被遗忘的“文学史”——关于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藏吴梅〈中国文学史〉》。

③ 王学珍等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1081—108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④ 参见郑振铎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86—96页，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

祖说出来,自然很有分量。

虽同属新文化人,比起胡适或同门的周作人、钱玄同来,朱希祖的文学观念受章太炎影响很深,显得比较传统。他在1917年11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

近来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主持文学者,大略分为三派:黄君季刚与仪征刘君申叔主骈文,而刘与黄不同者,刘好以古文仿今文,古训代今义,其文虽骈,佶屈聱牙,颇难诵读;黄则以音节为主,间仿古字,不若刘之甚,此一派也。桐城姚君仲实,闽侯陈君石遗主散文,世所谓桐城派者也。今姚、陈二君已辞职矣。余则主骈散不分,与汪先生中、李先生兆洛、谭先生献,及章先生(太炎)议论相同。此又一派也。^①

可见新文化运动刚开始时,朱希祖仍在骈散之争那里打转。而到了1919年初发表《文学论》,则是另一种境界:

吾国之论文学者,往往以文字为准,骈散有争,文辞有争,皆不离乎此域;而文学之所以与他学科并立,具有独立之资格,极深之基础,与其巨大之作用,美妙之精神,则置而不论。故文学之观念,往往浑而不析,偏而不全。^②

这也才能理解,1920年刊行《中国文学史要略》时,朱希祖必须澄清自己已经变化了的立场:“盖此编所讲,乃广义之文学。今则主张狭义之文学矣,以为文学必须独立,与哲学、史学及其他科学,可以并立,所谓纯文学也。”^③

很少采纳通用教材,而喜欢临时印发讲义,这是老北大的一个传统。这么做,成本较高,而且随意性强,校方曾试图纠正。1917年12月11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刊发了《评议会致本校全体教员公函》,希望教员们向书店定购公开发行的教科书,或将自家讲义修订出版。当然,话没说绝:“专门科学及其他高等学术,无适宜之教科书或参考书时,可由教员随时酌定印发讲

① 转引自朱偰《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文化史料丛刊》第5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

② 朱希祖:《文学论》,《北京大学月刊》1卷1号,1919年1月。

③ 朱希祖:《〈中国文学史要略〉叙》,《中国文学史要略》,北京大学刊本,1920年。

义。”文科学长陈独秀的态度则更为强硬,要求自下学期起,预科采用教科书,本科则一律改用口授笔述:

鄙意大学印发讲义实非正当办法,文本科业已有数种学科,由教员口授,学生笔述,未发讲义,亦无十分困苦难行之处。^①

但这个规定没能真正实行,1920年鲁迅到北大讲中国小说史,照样是每周提前寄送讲义,以便工友缮写石印,上课前发给听讲的学生。1928至1930年在北大旁听的两位日本留学生、日后成为著名汉学家的仓石武四郎(1897—1975)和吉川幸次郎(1904—1980),都曾在回忆录中饶有兴趣地介绍北大这一课前发讲义的制度。^②

大学之所以需要印发教员编撰的讲义,有学术上的考量(如坊间没有合适的教科书,或学科发展很快,必须随时跟进),但还有一个很实际的原因,那就是教员方音严重,师生之间的交流颇多障碍。仓石武四郎和吉川幸次郎当年曾结伴在北大旁听,日后回想起朱希祖之讲授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史学史,不约而同地都谈及其浓重的方音。在《中国语五十年》中,仓石武四郎是这样回忆的:

那时北京大学的老师,大多是江浙一带的人,如要学习浙江的方言,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因为每天都有许多浙江方言充斥你的耳膜。不过,要想明白它的意思,可就不那么容易了。其中有一位名叫朱希祖的老师,听说他后来在战争中去逝了,他的下巴上留着浓密的胡须,被人叫做朱大胡子。聊起这位老师时,我们就把手横着贴在胸前,表示胡子已经长到那里了。他教授文学史方面的课,但他说的话实在是太难听明白了。……不过我又想,中国的学生们怎么样呢?就问旁边的同学,他回答说完全听不懂。……几乎所有的老师都使用课堂资料,但这位朱希祖老师却不用,上来就讲,所以学生们都听不太懂。

① 参见陈独秀《致文科全体教员诸君公函》,王学珍等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1179页。

② 参见仓石武四郎著、荣新江等辑注《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210—212页、233—23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吉川幸次郎著、钱婉约译《我的留学记》48—51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

不过,“完全听不懂”却还如此镇定自若,我真是十分地惊讶。^①

而在《我的留学记》中,吉川幸次郎也专门提到浙江海盐这地方语言之难懂:“当我对旁边的同学说,我只听懂了1/3,旁边的同学说:朱大胡子所说的,我也听不懂。”接下来,吉川还绘声绘色地讲述了北大的“排朱运动”,起因正是“朱希祖先生马虎了事地经常拖延交出讲义,而其讲话又难于听懂”^②。早年的《中国文学史要略》,因“与余今日之主张,已大不相同”,不好意思再拿出来;而预告中的《新编文学史》,又一直没有完成。学术兴趣早已转向史学的朱希祖,对“中国文学史”这门课大概有些敷衍,这才会引起学生的不满。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林著固然蜻蜓点水,朱著也没多少独创性可言,至于吴著,连他自己都有意无意地遗忘了。说到底,这些都是普及知识的“讲义”,不是立一家之言的“著述”。之所以重刊这三种“过时”的讲义,不外是借此呈现早年北大的课堂,并凸显文学史作为一个学科的成长历程。对于一般读者来说,没必要细数这些陈谷子烂芝麻;至于专攻文学史或学术史的学者,此类藏本很少、搜寻不易的讲义,还是值得翻阅的。

此次影印刊行,林传甲《中国文学史》选择的是1910年武林谋新室的校正本(1914年六版);朱希祖《中国文学史要略》采用了北京大学一年级讲义本(铅印);吴梅《中国文学史》用的则是为北大文科国文门三年级准备的石印讲义。需要说明的是,吴著原藏巴黎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图书馆,书题《中国文学史(自唐迄清)》,实际上只写到了明代,而且三册中有一半是资料及作品选。这回影印的,只是其中的文学史论述部分。很可惜,石印讲义本就效果不好,加上年代久远,有些字迹模糊不清。开始还想代为描摹,后来发现“越描越黑”,还不如干脆保持原状。这样一来,不太清晰之处,也就只能鼓励读者充分发挥辨析与想像力了。

2005年8月20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① 仓石武四郎著、荣新江等辑注:《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233—234页。

② 吉川幸次郎著、钱婉约译:《我的留学记》49—50页。

目 录

序·····	陈平原(1)
中国文学史·····	林传甲(1)
中国文学史要略·····	朱希祖(239)
中国文学史(自唐迄清)·····	吴 梅(315)
附录 不该被遗忘的“文学史” ——关于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藏吴梅《中国文学史》·····	(613)

中国文学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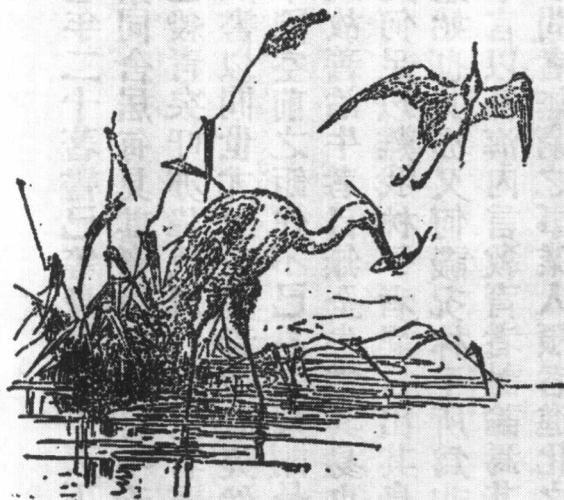
林传甲 编著

中國文學史序

吾友林子歸雲著書才也年二十著書已等身聲譽半天下甲辰夏五月來京師主大學國文席與余同舍居每見其奮筆疾書日率千數百字不四閱月中國文學史十六篇已殺青矣吁亦偉哉或曰古之著書者瘁畢生精力所得常不能累寸而勒成書以問世尤致兢兢焉或且夷然不自屑也今林子乃於忽忽百日間出中國空前之鉅作不已易乎余謂是不然天下惟視事甚難而事乃卒無一就故善治牛者目無全牛惟其易也夫著書至難事也而林子猶易之天下更何足以難我林子者異日出其身以任天下事猶之是書也任事則成事之始也其亦又何譏况林子所爲非專家書而教科書固將詔之後進頒之學官以備海內言教育者討論焉其不可以過自珍秘者體裁則然也雖爲學問者無窮之事業人類者進化之動機他日者國民程度益以高林子學識益以大乃徐取其少作而芟夷刊定之使底於至精且粹或復屬不敏爲之操觚揚權之則天下躊躇滿志者寧有過是歟故余非第序林子今日之書也余且爲學界之前途企也光緒甲辰季冬之望

中國文學史 序

弋揚江紹銓序



中國文學史目次

第一篇

古文籀文小篆八分草書隸書北朝書唐以後正書

之變遷

一	論未有書契以前之世界	二
二	論書契創造之艱難	二
三	論書契開物成務之益	三
四	論五帝三王之世古文之變遷	四
五	古文藉許書而存	四
六	六書之名義區別	五
七	六書之次第	五
八	古文籀文之變遷	六
九	籀文以後之變遷	七

第二篇

古今音韻之變遷

十	大篆小篆之變遷	七
十一	傳說文之統系	八
十二	篆隸之變遷	九
十三	篆隸與八分之區別	一〇
十四	隸草之變遷	一一
十五	北朝南朝文字之變遷	一二
十六	唐以後正書之變遷	一三
古今音韻之變遷		一三
一	羣經音韻	一三
二	周秦諸子音韻	一四
三	漢魏音韻	一五
四	六朝音韻	一五
五	經典釋文音韻	一六